

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研究*

熊美娟**

一、研究問題及意義

澳門特區自成立以來，社會整體發展相對平穩，“博彩新政”帶動了經濟呈現跳躍式增長，澳門社會日益面對從半開放到全面開放、從低度競爭到高度競爭、從傳統到現代的衝擊，同時全球化和周邊區域環境變動也給澳門帶來了發展的契機和活力。隨著社會大環境與政治生態的改變，澳門民衆由原來的民風保守、政治冷漠逐漸變為政治興趣增長、政治參與熱情增加；但是從社會發展來看，隨著澳門經濟的急速增長，社會日益顯現出貧富分化較為嚴重的態勢，房屋、外勞等政策問題不斷出現，居民遊行示威事件不斷湧現，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澳門居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處於上升趨勢。

政治信任是信任的一種形式，一般定義為公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不僅有助於政治穩定和發展，也可以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¹，使政府運作更為順利。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政治信任視為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晴雨表，政治制度表現的溫度計。自美國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關注其政治信任的狀況以來，引發了對政治信任關注的學術熱潮，政治信任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以澳門特區居民的政治信任為研究對象，試圖厘清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狀況，並探討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

二、政治信任的涵意及理論解釋

對政治信任進行研究，首先要明確政治信任的概念。根據伊斯頓對政治系統的分析，共有三類：政治團體（Political community），

* 本文於2010年7月2日“提升公共管治能力二零一零年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政治博士研究生。

1. 周汝江、高釗翔：《話語的張力：政治信任流失——從“山寨文化”說起》，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06-109頁。

即共用政治分工的廣義的政治群體人員；政治制度（regime），政治權力共用的遊戲基本規則；最後，當局（the Authorities），對制定和執行政治決策負責的選舉和任命的官員。很多學者也據此認為，政治信任從結構上來說主要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對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二，對政府的信任；第三，對政府人員的信任。²

由此，政治信任是公民與政府間的一種互動，它涉及公民、政府與特定價值之間的特定關係，是民衆基於理性思考、實踐感知、心理預期等對於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職人員行為的信賴，是一個歷史的，不斷調整、修復和發展的動態過程。

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一種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的經濟學解釋；一種是以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為基礎的文化理論解釋。

從理性選擇理論角度來看，政治信任可以被解釋為公衆對物質利益的計算，即對政府行為的關注，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基於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他們認為，政治信任取決於政府為人們提供好的政策和好的途徑的能力，以及人們對政府官員是否是“好人”的感覺。因此，政府績效決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個表現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贏得公民的信任的。從績效角度來看，信任主要依賴於人們對政治機構所能提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福利程度的評估。用哈丁的話來說，信任是遵循經濟學和算術學的邏輯，即信任起始於對被信任者的承諾所做的評估。³正如理性選擇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所指出的，結構和制度因素在形成人們對權威的態度時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例如，在民主化的臺灣，政治信任可能更多是和政府績效相聯繫的。⁴

2. 參見宋少鵬、麻寶斌：《論政治信任的結構》，載《行政與法》2008年第8期，第25-27頁。

Citrin, Jack. Comment, Sep. 1974,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973-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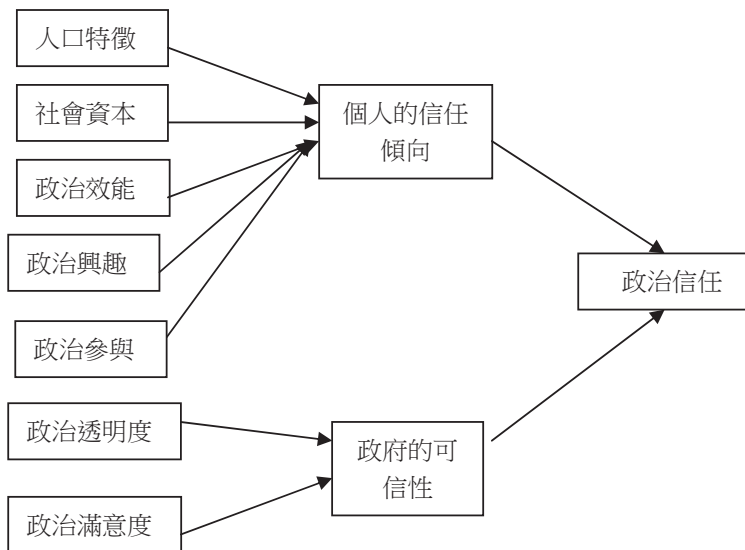
3. 【美】馬克·E·沃倫：《民主與信任》，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4. Tianjian Shi, Jul.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 401-419。

文化理論，包括社會學的和社會心理學的解釋，強調的是基本的政治價值觀和信念，是政治社會化導致的廣泛支援的形式。文化主義者的觀點則認為，短期對物質利益的計算只能說明部分問題。文化主義者並不否認人們的取向是由制度以及最終引起取向改變的制度改變所形成的。但是，政治文化的改變通常落後於制度的改變，而不和制度改變同時。因此，人們的價值取向能夠獨立地影響他們的行為。

本文則主要側重於從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的經濟學解釋，並認為政治信任是公民和政治系統之間互動的一種表現。從這種互動來說，政治信任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信任者（即公民）的信任傾向，二是被信任者（即政治系統）自身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因此，本文的研究框架（見下圖）也建基於此，即政治信任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信任者自身的因素，二是澳門政治系統的可信度。

圖1：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因果路徑



三、資料、研究方法和變數的測量

2010年3月至5月，本人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該問卷為結構性問卷，採用了電話隨機抽樣發放、通過社團成員代為隨機發放的方式，

合計發放問卷1033份，收回800份，有效回收率為77.44%。本文主要應用該數據進行澳門居民政治信任影響因素的解釋性研究。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是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分析層次主要集中在澳門居民的個人層次上。本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為主，具體的統計方法主要包括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等方法。本研究的資料處理和分析主要使用SPSS 16.0統計軟體。

針對政治信任的測量，筆者主要是借鑒了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測量方式⁵，但是“信心”和“信任”還是有一定差異的，為了更好地測量政治信任，本研究在問卷中將“信心”改為“信任”，但保留問題的提法不變，因為這種提法較為直截了當，使測量的信度和效度能得到有效保證。就澳門地區來說，由於澳門採用的是行政主導體制，所以我們測量的政治信任的客體主要是針對政府組織、政府成員和立法會，而沒有對司法組織單獨測量，即最後選取了4個物件對象進行測量，分別是澳門特區立法會，澳門特區政府組織，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司長、局長等政府官員和澳門特區一般公務員。

根據我們的研究框架，政治信任是居民和政治系統之間互動的一種表現，因此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信任者（即居民）的信任傾向，二是被信任者（即政治系統）自身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從居民的信任傾向來說，筆者主要選取了如下變數：人口統計特徵、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政治參與、社會網絡和社會信任構成的社會資本；從政治系統自身的可信度來說，筆者選取的變數主要是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⁶

5. 世界價值觀調查。該調查中對信任的測量是這樣的：以下我將提到一些組織，對每個組織，請您告訴我們您對它們的信心程度：是非常有信心、有些信心、不太有信心還是完全沒信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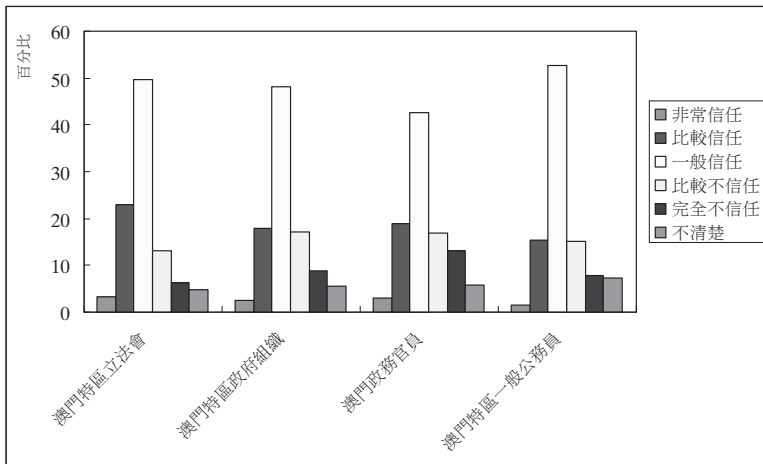
這些組織包括教堂、軍隊、新聞出版屆、電視、工會、警察、法院、政府、政黨、議會、行政部門、主要的大公司、環境組織、婦女組織、慈善或人道主義組織、歐盟、聯合國。一般來講，測量政治信任主要是針對其中幾個組織的，例如軍隊、警察、法院、政府、政黨、議會、行政部門。

6. 有關解釋變量的問題及處理情況如有疑問，請聯繫作者；本文因篇幅有限，在此不能詳述。

四、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現狀及解釋

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對該四類物件的信任程度總體來說相差不大，但對澳門特區立法會的信任程度總體來說更高（75.8%）⁷，而對政府組織（68.6%）、政治官員（64.5%）和一般公務員（69.7%）的信任程度差別不大，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總體來說處於較高的水平。具體來說，將非常信任和比較信任合計為較信任，則澳門居民對特區立法會的較信任為26.2%，而對政府組織、政治官員和一般公務員的則分別為20.4%、21.8%和17.1%；將一般信任的高低排序而言，澳門居民對一般公務員的一般信任比例最高，為50.4%，其次分別是立法會（49.6%）、政府組織（48.2%）和政治官員（42.7%）；將比較不信任和完全不信任合計為不太信任，則由高到低分別是政治官員（28.6%）、政府組織（24.9%）、一般公務員（22.8%）和立法會（18.6%）。

圖2：澳門居民對四類政治組織、人員的信任程度



由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因為正如哈丁所說，一般信任其實很難說是信任還是不信任，或者說是懷疑，所以較信任和不太信

7. 這裏對信任的測量，包括回答非常信任、比較信任和一般信任三類的百分比之和。

任能更為明確地反映這種信任的程度和取向，對它的比較和論述因此也更有意義。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澳門居民對特區立法會的較信任程度最高（26.2%），對它的不太信任的程度也最低（18.6%），即澳門居民對澳門特區立法會的政治信任度在同類組織和人員中可以說是最高的。筆者用配對樣本總體均值差異檢驗方法，統計結果顯示，澳門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和對政府組織、政府官員、一般公務員信任程度都有顯著的差異，顯著水平為0.01（見表1）。可以說，澳門居民將立法會視為較具有公信力的機構，視為和政府組織、政府官員、一般公務員不同的政治對象，前者較後三者具有更為權威、更為可信的形象。

表1 澳門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和對政府組織、政府官員、一般公務員信任程度的差異比較

變數	均值	標準差	樣本量	差異的均值	顯著度
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	2.9563	.87566	710	-.16479	P< 0.01
對政府組織的信任程度	3.1211	.90570	710		
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	2.9433	.87659	706	-.22946	P< 0.01
對行政長官、司長、局長等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	3.1728	1.00136	706		
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	2.9523	.87697	692	-.17197	P< 0.01
對一般公務員的信任程度	3.1243	.84150	692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除第一屆另有規定外，每屆任期四年。立法會的議員由直接選舉議員、間接選舉議員和特首委任議員三部分組成。⁸澳門現在是第四屆立

8. 第一屆立法會由二十三名議員組成，其中直接選舉產生議員八名，間接選舉產生議員八名，行政長官委任議員七名。第二屆立法會由二十七名議員組成，其中十名由直接選舉產生，十名由間接選舉產生，七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第三屆立法會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由二十九位議員組成，其中十二名由直接選舉產生，十名由間接選舉產生，七名由行政長官委任。以上信息來自澳門特區立法會網頁，詳見http://www.al.gov.mo/cn/cn_main.htm。

法會，共有29名議員組成，其中直接選舉產生議員12名，間接選舉產生議員10名，行政長官委任議員7名。基本法規定了澳門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立法行政關係，它具有一定的制度創新性，是中國根據港澳地區的具體情況而度身定做的一種制度設計。

立法會的主要功能是制訂法律和監督政府兩大部分，澳門居民為何對立法會具有這麼高的信任程度呢？這可以從立法會的職能加以解釋。立法會具有監督政府的職能，可以接受澳門居民的申訴並相應作出處理，議員可依照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議案，依照法定程序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這些職能賦予了立法會制約政府的權力。同時，立法會內的直接選舉議員更是由澳門居民親自選舉出來的，比起特首委任議員和間接選舉議員來說，他們的合法性更強，能有意願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表達民意。而且直接選舉議員更是澳門唯一由選民直接投票的選舉舞臺，所以更容易受到澳門民衆的認可。經過數次立法會選舉，澳門也已經培養出了一批勇於參政的華人社會精英。在2001年和2005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參與投票的人數不斷上升，2005年的選民登記人數比2001年的增加了6萬多人，達到22.06萬，顯示出澳門普通居民參政議政的意識不斷提高。⁹澳門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接受了西方民主價值觀，認為在選舉中投票是公民應盡的義務。所以立法會被澳門居民接受、認可程度最高，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從不太信任的指標來看，政府官員也是澳門居民在四類中最不被信任的。政府官員這裏是指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司長、局長等。政府官員的不被信任是各國、各地區都常有的事。而澳門主要是因為2006年的歐文龍貪腐案，對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造成了很大傷害。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自從歐文龍貪污事件被揭發後，行政長官何厚鏵的民意支援度和支援率錄得非常明顯的跌幅。比起2004年高峰期，何厚鏵的評分在2007年初累積下跌了15.4分，支援率下跌了22個百分點，而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亦下跌了23個百分點。可見貪污問題對政府的認受性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9. 婁勝華、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3頁。

五、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多元回歸分析及討論

為了全面且客觀地分析各種解釋變數對澳門居民政治信任變數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多元綫性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將各種變數採用全部納入法進行回歸處理分析，並且為了更準確說明各解釋變數和因變數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還漸次進行了5個模型的處理和分析（見表3），以達到更為準確的分析效果。

在模型1中，筆者只納入個人統計特徵的變數，結果顯示，性別、年齡（36-50歲、51歲以上）對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變數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在統計控制的條件下，澳門的男性居民相對於女性居民來說，政治信任度更低；年齡為36-50歲的澳門居民相對於年齡在18-25歲之間的居民來說，政治信任度更高；年齡為51歲以上的澳門居民相對於年齡在18-25歲以上的居民來說，政治信任度也更高；但是，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對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度並沒有顯著影響。通過T統計量絕對值大小的比較，可以判斷，在個人統計特徵變數中，年齡為36-50歲及51歲以上對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變數有著最為顯著的影響，性別為男性的影響相對較小。

在模型2中，筆者加入了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變數後，模型2的解釋力為11.39%，相比模型1的解釋力提高了約8%，即這些變數合共可以解釋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11.3%左右。研究發現，性別、年齡（36-50歲）變數並不因加入的其他變數而發生改變，但年齡51歲以上這個變量則變得不再顯著。具體來說，在統計控制的前提下，原有個人統計特徵變數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力和方向都和模型1都相同；同時研究顯示，政治興趣的兩個變量中，討論政治或時事話題的頻率也對政治信任度並沒有顯著影響；而關注政治、時事則對政治信任有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越是關注政策性新聞的澳門居民，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同時，政治效能也顯現了對政治信任較強的影響力，澳門居民的政治效能感越強，則其政治信任度越高。通過T統計量絕對值大小的比較，可以判斷，政策新聞關注度對政治信任度影響最強，政治效能感的影響次強，男性和年齡（36-50歲）的政治信任度影響最弱。

在模型3中，筆者又加入社會資本變數，模型3比模型2的解釋力據此又進一步增強了約13%，達到24.82%。研究發現，性別（男性）、政策新聞關注度、政治效能感等變數並不因加入的其他變數而發生改變，它們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仍然顯著存在；但是年齡（36-50歲）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則消失了。具體來說，在統計控制的前提下，社會網絡的三個變量中，只有參加社團組織變數有顯著影響，其他兩個變數，參加社會或文化活動的頻度及和親戚朋友聚會的頻度對政治信任度並沒有顯著影響；參加社團組織的人相比未參加社團組織的人，其政治信任度更高。研究結果也顯示，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度有非常顯著的影響，澳門居民的社會信任得分越高，則政治信任的得分也越高。通過T統計量絕對值大小的比較，筆者發現，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最強，影響其次的分別是政治效能、政策性新聞關注度和性別（男性），參與社團組織則對政治信任的影響相對最小。

在模型4中，筆者加入了政治參與這個變數，結果顯示，模型4比模型3只輕微提高了2%，達到26.02%，可見政治參與實際上並不和衆多學者的觀點一致，即政治參與雖然對政治信任有一定影響，但是影響並不大。研究顯示，性別（男性）、政策新聞關注度、政治效能感、社會信任等變數並不因加入的其他變數而發生改變，它們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仍然顯著存在；但是參與社團組織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則消失了。具體來說，在統計控制的前提下，新加入的政治參與變量中，積極參與政治相對於沒有參與政治的澳門居民來說，其政治信任度更高。通過T統計量絕對值大小的比較，筆者發現，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最強，影響其次的分別是政治效能、政策性新聞關注度和性別（男性），積極參與政治則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相對最小。

最後在模型5中，筆者加入了政府可信性的兩個變量：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結果顯示，模型總體解釋力已經達到34.89%，比模型4增加了約8%，顯示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變數對政治信任度的解釋力約為8%。在納入這兩個變數後，和模型4相比，原有的性別（男性）、政治效能、政策性新聞關注度、積極參與政治、社會信任變量依然都保持顯著，而且，對政治信任影響顯著的還增加了社會活動和消極參與政治變數。具體來說，越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的居民，其政治信任度反而越低；但是消極參與政治的居民則相對沒有參與的居民

來說，反而政治信任度較高；同時，新加入的兩個變數中，澳門居民的政策滿意度越高，則其政治信任度越高；澳門居民感受到的政治透明度越高，則政治信任度也越高。通過T統計量絕對值大小的比較，筆者發現，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最強，其次是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政治效能感則更次之，接下來分別是性別（男性）、積極參與政治、消極參與政治、參與社會文化活動、關注政策性新聞這些變數。總體而言，可以看到，除了社會信任變數外，政府的可信性也對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度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表2 澳門居民政治信任因子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模型分析

變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系數	T統計量	系數	T統計量	系數	T統計量	系數	T統計量	系數	T統計量
個人社會經濟變量										
性別（男性）	-0.86*	-2.29	-1**	-2.77	-1.1**	-3.20	-1.12**	-3.27	-0.81*	-2.49
年齡：										
26-35歲	0.11	0.20	-0.12	-0.22	-0.32	-0.62	-0.35	-0.70	-0.06	-0.13
36-50歲	1.53*	2.56	1.18*	2.04	0.96	1.81	0.92	1.74	0.80	1.61
51歲以上	1.86**	2.65	1.18	1.72	0.44	0.68	0.47	0.72	0.36	0.59
受教育年限（年）	-0.01	-0.11	-0.04	-0.53	-0.09	-1.26	-0.11	-1.59	-0.08	-1.24
工資：										
5000-10000澳門元	-0.9	-1.44	-0.79	-1.30	-0.58	-1.02	-0.93	-1.60	-0.58	-1.06
10000-15000澳門元	-0.47	-0.68	-0.74	-1.11	-0.86	-1.38	-1.16	-1.85	-1.15	-1.95
15000澳門元以上	-1.16	-1.48	-1.19	-1.55	-0.93	-1.32	-1.12	-1.58	-0.61	-0.90
討論政治或時事話題的頻率			-0.22	-1.14	-0.22	-1.15	-0.23	-1.23	3.04	0

變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系數	T 統計量	系數	T 統計量	系數	T 統計量	系數	T 統計量	系數	T 統計量
關注政策性新聞的頻率			0.73**	4.69	0.58**	3.88	0.56**	3.78	0.28*	1.97
政治效能得分			0.53**	4.46	0.50**	4.43	0.48**	4.22	0.42**	3.97
社團組織參與(參加)					0.84*	2.13	0.56	1.39	0.43	1.14
社會文化活動的參與得分					-0.23	-1.4	-0.3	-1.81	-0.31*	-1.99
和親戚朋友聚會頻率					0.01	0.05	0.01	0.03	-0.11	-0.78
社會信任得分					1.15**	8.89	1.20**	9.22	0.91**	7.13
政治參與：										
消極參與							0.52	1.06	1.01*	2.16
積極參與							1.34**	2.93	1.01*	2.35
政策滿意度總分									0.17**	5.94
政治透明度得分									0.89**	4.57
常數項	9.16**	7.42	7.02**	5.71	5.33**	4.46	5.48**	4.6	3.10**	2.68
Adj R-squared	0.0347		0.1139		0.2482		0.2602		0.3489	
F檢驗量	3.20**		6.71**		11.76**		11.12**		14.79**	

注：（1）所有模型的有效樣本量為490人。

（2）“*”表示顯著性 $P < 0.05$ ，“**”表示顯著性 $P < 0.01$ 。

（3）F檢驗量表示模型整體顯著性的統計檢驗值。

（4）Adj R-squared為調整的確定系數，表示在考慮自變量數量條件下的模型解釋能力，即包含一定數量自變量的模型可以解釋因變量（政治信任因子）變化的比例。

（5）在各自變量中，性別的參照類為女性；年齡的參照類為18-25歲；工資的參照類為5000澳門元以下；參加社團組織的參照類為沒有參加社團組織；政治參與的參照類為無參與。

從以上對5個模型的分析來看，男性居民相比女性居民而言，政治信任度更低。從個人的其他特徵來說，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政治參

與、社會網絡和社會信任度都對政治信任度有一定影響。而其中社會網絡的變量中，只有參加社會文化活動對政治信任度有一定影響，社會信任又是所有個人信任傾向和政府可信性兩個因素中解釋力最強的一個變量。從政府的可信性來說，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都對政治信任有顯著影響，其中前者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又比後者稍強一些。

據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看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情況，男性居民相比女性居民更不信任政治。這可能是由於地區差異造成的，日本學者對該國的研究顯示，該國男性居民對政府來說一般更為忠誠，更為信任政府，這可能是由於日本地區的特殊文化造成的。我們的研究結論在這點上和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更為類同，即男性一般來說更容易展示這種積極的不信任態度。¹⁰

年齡越大則政治信任度越高。我們的研究顯示，相比於18-25歲，36-50歲之間的人政治信任度最高，這可能是由於他們處於經濟上較為安全的時期，同時，他們的社會轉型體驗和經歷與年輕人的完全不同，他們的觀察視角也比年輕人會更成熟一些，總體來說，澳門特區成立前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是截然不同的，特區成立後的經濟穩步增長，社會秩序明顯好轉，這些對36-50歲之間的人來說，有著更為切身的體驗，相較來說，3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記事起也親身感受到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年輕人一般來說對一切都更傾向於懷疑的態度，而這種懷疑表現在政治上，其不信任度就會越高。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情況對政治信任變數的影響都不顯著。對於教育來說，這可能是由於教育和收入之間有較強的相關關係，因此納入模型時出現共線性問題，但模型中我們發現，即使去掉收入變數，教育變數仍然不太顯著。這或許是由於澳門特殊的產業情況。澳門博彩業從2002年以來極速發展，造成對人力資源的極度渴求，“不少年輕人高中畢業不思升學，急著到娛樂場搵快錢”¹¹，而博彩業的高工資

10. Cook Timothy E. and Gronke Paul, Aug. 2005, The Skeptical American: Revisiting the Meaning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7 (3): 784-803。

11. 畢永光、龍土有：《澳門博彩業十年發展快速 尚需有序有度》，2009年12月12日，22:41，來源：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ga/news/2009/12-12/2014742.shtml>，2010年6月21日查詢。

也使教育和收入之間的關係變得不太密切。但總體來說，收入對政治信任的影響也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於收入本身的分類之間差距並不太大，真正的高收入群體在樣本中較少，因此收入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在這裏難以顯著。

在社會資本變數的測量中，我們發現，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有最為顯著的影響，而社會網絡變數中只有參與社會、文化活動對政治信任有相對較弱的負相關。這和以前的一些研究結果是相符的。有學者發現，在志願社團和政治信任之間的關係也是模糊的，並且令人困惑的。首先，人們的社團活動不再為他們信任他人或政府提供有意義的依據。其次，和托克維爾的期望相反的是，社團生活似乎也與是否支援政府機構這個問題並不相關。這也間接指出了社團生活不再是政府可以依賴用來維持其合法性或有效統治的來源。政治信任現在更加依賴於政治本身。¹²而越參與社會、文化活動，則居民會變得越不信任，這可能是由於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的人本身教育程度較高，較其他居民更容易發現政策的缺陷，因而政策滿意度較低，從而引發了其較低的政治信任。

社會信任也即普遍信任，是指居民對大多數陌生人的信任程度。¹³社會信任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預測政治信任的一個重要指標。一些學者認為，社會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礎，一個缺乏社會信任的社會是不可能孕育出政治信任的。即一般來說，人們不能信任其他人，那麼他一般也不會信任那些政治職位上有權力誘惑的人。¹⁴而且Edgar Litt發現，政治環境（Political Milieu）成為了公民不信任的主要因素。由此，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的有相關關係的背景地區一般是一個相對和平、有共識的社會¹⁵，這也是和澳門相符的。澳門社會經常被

12. Damico, Alfonso J. & Conway, M. Margaret Sandra, & Damico, Bowman, Spring. 2000, Pattern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Mistrust: Three Moments in the Lives of Democratic Citizens, *Polity*, 32 (3) : 377-400。

13. 【美】埃里克·尤斯拉納：《信任的道德基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14. Aberbach, Joel D. and Walker, Jack L., Dec. 1970,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4) : 1199-1219。

15. Litt, Edgar, 1963,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F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s*, 25: 312-23。

稱為“熟人社會”，面積小，人口密度極高，人們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所以這種政治環境決定了澳門居民的社會信任是和政治信任有著高度聯繫的。

政治效能是指個體對自己能否影響政治活動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Stokes對美國全國選舉研究的資料分析表明政治效能的感情和政治信任之間有著相關關係。他假設，在一些條件下，人們會發現主觀的無能為力感是和對政府的積極態度相聯繫的，但是“在民主價值觀環境中，對公眾權威的無能為力感傾向於導致對權威的敵意”。¹⁶Cole也發現只有政治效能對政治信任有一定影響。我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點，但是相對而言，政治效能對政治信任的因果關係只有相對較小的影響，這點也和Cole等人的研究結果類同。¹⁷

政治興趣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對政治關注的程度，也稱為政治關注度。我們使用了2個問題進行測量，結果第一個問題即和親戚朋友談論政治、時事的頻度和政治信任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政治興趣並不一定體現在談論政治、時事的頻度上，而更多地體現在對政策性新聞關注的程度上。對政策性新聞的關注會使民衆感到自己是社會的一員，並使民衆積極參與政治，從而能發揮一定的政治作用，增強對政治的信賴感。

政治參與是普通的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定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我們的研究發現，積極參與和消極參與相對於不參與都會導致較為積極的信任態度。這可能是由於政治參與給澳門居民提供了民意表達的渠道。一個參與渠道暢通、能夠以系統內大多數民衆的利益和意願為依歸的政治系統必然增強民衆對該系統的信任感和歸屬感，其統治能力也會得到增強。而對一個長期壓制公民參政要求的政治系統來說，其政府政策

16. Stokes, Donald E. "Popula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Harlan Cleveland and Harold D. Lasswell (eds.), *Ethics and Bigness: Scientific, Academic,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w York: Harper, 1962. pp. 61-73.

17. Cole, Richard L., Nov. 1973, *Toward a Model of Political Trust: A Caus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4): 809-817.

必然無法反映民衆意願，因此該系統的合法性也會遭到削弱。因此，不管是積極的參與還是消極的反對式的參與，只要民意通過了一定的渠道得以表達出來，就會使民衆感到政府的誠意，進而認可政府的合法性，並提高居民的信任程度。

政策滿意度在本文中特指澳門居民對澳門特區政府制定出的政策的滿意程度。其中政策主要是指七類，分別是社會保障政策、醫療衛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就業政策、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和外勞政策。研究發現，對澳門居民政治信任度影響第二強的就是政策滿意度。回應之前的理論解釋路徑，如Miller強調指出，政治事件、政治態度和期望是對政府不信任的首要來源。政治精英“生出”政策；作為交換，他們得到了對這些政策滿意公民的信任，和對這些政策失望公民的懷疑。¹⁸因此，也證實了如下的假設：人們感到和自己期望的差距越大，人們就會對政府越不信任；Kim也發現機構績效是決定政策參與的一個關鍵變數。¹⁹

政治透明度，是政治機構政治活動的公開程度，也即民衆對政治權力機構及其權力運行狀況的瞭解，是對其信任的前提條件，也是公民有效監督政治權力機關及其權力運行的基本條件。²⁰澳門自從發生“歐文龍”案件以來，民衆對政治透明度的要求日益提高，崔特首也在施政報告中多次提到“陽光政府”的理念。我們的研究也證實了民衆感受到的政治透明度越高，則政治信任也相應提高。這個因素也是以往研究中經常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體而言，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處於較高水準，其中澳門居民對立法會的信任程度最高，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相對較低。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又可以由性別、政治興趣、政治效能、社會網

18. Miller, Arthur H., Sep. 1974,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 951-972。

19. Kim, Ji-Young, Apr. 2005, “Bowling Together” Isn't a Cure-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 (2) : 193-213。

20. 宋惠昌：《政治透明度與政治信任度》，載《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絡、社會信任、政治參與、政策滿意度、政治透明度來解釋，在這些因素中，社會信任又是對政治信任影響最強、最有解釋力的變數；政策滿意度和政治透明度的影響次之。

可見，作為熟人社會的澳門，人們對澳門社會的認可、對澳門大多數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民眾政治信任的基石。而作為澳門特區政府來講，為提升澳門居民的政治信任度，保證社會持續穩定向前發展，政府應該著重加強政府績效的提升，即提升澳門居民對各項社會民生政策的滿意度，尤其是現在澳門居民深感問題嚴重的房屋政策、外勞政策、就業政策等。同時，政府也應注意提升政治透明度，加大政務公開的力度，踐行“陽光政府”的承諾。